

地举行一些文艺晚会,学员们自己拉手风琴、唱歌和表演小节目,有时还邀请附近工厂的女工来跳舞,也有时看看电影或文艺演出。1929年夏,中国连学习结业时,我与一起当翻译的乔丕成得到去南方海边休假的机会。当时乔丕成已经结了婚,他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到了黑海之滨的安拉普。我们去后没有住在正式的疗养院里,被安排在集体农庄的农民家里。这家房东住得相当宽敞,经济状况相当于中农。乔丕成夫妇住在里头的房间里,我就在那家走廊上安了张床。好在那时天气很暖,我身体又好,晚上听着阵阵海涛声,享受着海风的轻拂,倒也十分舒适自在。我们在那里每天下海游泳和到附近观光休息,真是悠闲得很。当地盛产葡萄,我们天天足吃一气,休假结束时还买了许多带回莫斯科,送给在家的同志们分享。我们在休假中自然地成了集体农庄里的客人。农庄主席曾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集会,并要求我们中国同志给大家讲话,乔丕成推我来讲,我也就应承下来,略加思索就作了即席发言,我讲了些中国概况及我国革命的情况,赞扬了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在场的俄罗斯乡亲们见我这个中国客人能非常流利地用俄语讲话,感到特别亲切和欢迎,乔丕成夫妇也说我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心意。

我们在步校时,与那里的苏联同志接触不少,相处得很好。他们常常帮助中国学员学习俄语,辅助训练活动。苏联教员对中国学员的刻苦好学精神很赞佩,常把我们请到他们家里去做客,相互十分尊重、友好。当时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同志为了不暴露自己原来的姓名身分,也为了便于与苏联同志接触,每人都取一个俄罗斯式的姓名。我在中山大学时就被叫做皮达可夫。王智涛到苏联后就取名为泽林斯基。吉合同志原名田德修,他的俄文姓氏是吉合诺夫,回国以后留下前两个音作为自己的名字,并且用了整个后半辈子,结果使他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这事也多少反映了当年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革命友谊与亲密感情。

告别莫斯科步兵学校

中国连于1929年夏结业以后,学员大部分陆续被输送回国参加斗争,少数留在苏联继续学习或工作。此后不久,苏军远东部队与我国东北军阀发生了被称为“中东路事件”的军事冲突,我和梁振鸿、彭文畅等几个同志奉命调出步校去远东随苏军行动,战事结束后就被留在伯力的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这就告别了莫斯科步兵学校。王智涛、吉合等

之间的边界战争。组织上决定抽调一批翻译到远东去协助苏联军队工作,一共调了约十个人。带队的是周岱云,他留在伯力,梁振鸿到海参崴,彭文畅到赤塔,王懋坚到黑河,还有分到别处的。

当时苏军正同驻黑龙江的张学良部交战,我随一个营当翻译。这个营乘着内河的舰艇,沿黑龙江向中国境内航行。航行约一昼夜,进到松花江边上的富锦,部队上岸后驻扎在县城的街道上。当地的中国军队已经撤走了。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动员当地老百姓到一个面粉仓库去拿面粉,谁愿拿多少就拿多少,还让他们招呼别人也去拿。老百姓当然很高兴,街上一时都是背着面粉的人。

在远东保卫局做了三件事

当天下午即接到上级通知,战事宣告结束,我们仍然乘原艇返回伯力。我被安排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名义是见习员。去后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苏军俘虏了东北军一个旅几千人,旅长韩光第也在内,被置于红河俘虏营。我和周岱云被派去进行俘虏的调查登记工作,同去的还有几名苏联同志。这件工作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因中苏两国政府已签订了和平协议,当时中方的代表是莫德惠,不久这批俘虏便全部被遣返回国了。

第二件事是苏军在东北时,每到一个县城后,就将当地政府的公文卷宗统统缴获弄了回去,满洲里、海拉尔等好几个县的公文卷宗都搬来了,要我们清理这些材料,每一份都得看,要发现并选出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翻译给有关方面参考。这可是件沙里淘金的工作,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很少,只有少数高级机关的通报之类还多少有一点内容。

第三件事是当时边界上走私的特别多,那时苏联经济上很困难,一些人从中国把半旧的西装、日用品或者高级的食品运到苏联,就能赚大钱。苏联很怕这些走私犯搞他们的情报,就把同走私犯的斗争当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分配我协助对走私犯的审讯工作。我发现他们大都是一般的经济犯,只要不是间谍和政治犯,对他们的处理都很轻,弄清了问题后,立即遣返他们回中国境内了。

转为苏共候补党员

1930年12月,是远东边疆保卫局成立10周年纪念,保卫局领导机关要出版一本纪念册,指定我写一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在纪念册上发